

DOI: 10.13484/j.cnki.ndxbzsb.20170312

民国时期北京旗人的“社会形象”及其身份认同

杜佩红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北京 100872)

摘要: 民国时期,北京旗人生活日益困苦,再加上“排满”风潮,使得他们逐渐沦为社会底层人士,很多旗人不得不从事一些他们认为是低贱的行业来维持生计。这一时期,无论是官方,还是媒体、社会大众,都对旗人的固有习性存有偏见,认为旗人的这些特征是造成北京社会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这种社会形象下,北京旗人的自身身份认同发生了变化,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得不对外隐瞒自己的民族身份。

关键词: 民国时期;北京;旗人;社会形象;身份认同

分类号: K258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18(2017)03-0073-06

民国成立后,旗人^①失去了往日的政治特权。当丧失了以往特权后,旗人的生活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其他社会群体如何看待他们?社会舆论形塑了旗人怎样的“社会形象”?这对旗人的身份认同又有何影响?学界对这部分讨论尚存不足^②,本文尝试作一补充。

一、旗人贫困的加剧及其成因

谈到民国时期北京旗人的生活状况,一个绕不过的关键词便是贫困。关于其生计的相关研究,目前学界已有论述,因而本文对这部分只作一个简要概述。

民国成立后,旗人生活贫困已然非常普遍,即使是一些昔日王公也日益穷困,不得不通过变卖家产来维持生活,直至破产。如庄王的一个后代,最终饿死在南横街会馆的空房子里,死后也无人收尸;睿王的后代钟氏兄弟,因生活无着而去掘祖坟。这样的现象可以说屡见不鲜。^{[1][96]}据1921年甘博对北京社会的调查,“在内城,赤贫超过人口10%的警区只有三个。其中的两个,即中心一区和中心二区,位于皇城内。由于这一地区从前是专为皇族及其家庭划置的,居住在这里的绝大部分是满族人。在内城右翼三区,满族人也占了总人口的绝大部分,在那里15.8%的人

口属于赤贫”^{[2][292]}。虽然他未对北京城中满族贫困者的总体比例做过准确估算,但从他统计的贫困人口分布来看,在满族人聚居区内的贫困人口比例相当高。牛霖鄂在《北平1200贫困户之研究》中说“在调查的1200贫困户中,自称满族者计393家,合32.75%。”但其中很多贫困户不愿承认自己是旗人,因此实际上满族贫民数所占比例要大于这个数据。据牛氏估计,可能北平城内一般的贫民都是满族。^{[3][706-707]}北京郊外旗人的生活境况也同样不好。如1930年一位报社记者曾在香山住了一个多月,就对健锐营中旗人的贫困问题有很深的印象。^[4]1937年,维馨也说道“清室逊位后,旗人生计困难,因而昔日繁华的蓝靛厂,现在却很萧条。而同为营房的圆明园镶蓝旗还不及外火器营。这里的旗民因无一技之长,多涉军、警二界,但是当兵却更苦。民国十四年直奉战争,奉军退到蓝靛厂之二旗营,为期约有半年,士兵不守军纪,拆门窗以为燃料,掠民物为私有。旗民遭此劫盗,生活更加穷困。”^[5]

旗人生活贫困并非民国时期才发生的,而是清朝中后期清廷就一直面临的问题,但民国时期的旗人贫困与清代有根本上的不同:

一是政府支持减少。旗人生计问题早在康熙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2016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资助计划项目

收稿日期:2016-12-12

作者简介:杜佩红,女,山西孝义市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中叶便开始出现,自雍正至乾隆、嘉庆、道光时期,情况逐渐恶化。针对旗人生计困难的问题,清廷采取了很多措施。但进入民国后,旗人的政治地位大幅下降,政府对旗人群体不再优待,旗饷日渐减少,以至于无;而旗地制度也基本瓦解,旗人失去了最后的生计保障,因此民国旗人的贫困是釜底抽薪式的。除了靠旗人自救外,已无法靠政府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不论是上层王公贵族,还是下层普通旗丁,都普遍贫困化了。

二是社会歧视加剧。晚清以后,“排满”之风随着革命的宣传而日益盛行。陈天华在《猛回头》中就描写道“那丁壮,编旗下,充当苦役……那田地,被圈出,八旗享受;那房屋,入了官,变做旗庄。”^[6](46-47)]而革命军的首要目标便是“驱除鞑虏”。这些口号一时间在全国各城市中广为流传。民国成立后,这种“排满”之风并没有消失,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在北京又掀起了一次“排满”浪潮。据金启琮回忆“刚过十岁的我(笔者注:1932年),早出晚归,筋疲力尽。但等到结束工作时,班主任悲痛地慷慨讲话中说‘我们大家都对此事(笔者注:伪满洲国成立)感到十分悲痛’。但是忽然指着我说‘只有他一人高兴了’。我当时为之愕然,甚至没听懂他的话,后来同学向我解释,我才明白自己的处境。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竟会与东北沦陷,与伪满洲国发生关系。”^[7](157-163)]另一位名叫赵淑华的旗人也有类似的回忆“我上学时最讨厌听历史课本中的清朝部分,听着头痛。有些老师简直是在煽动排满情绪。”^[1](116)]

因而,旗人在就业等方面就常受到歧视,在《满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关于北京市的满族调查报告里就提到“满族工人首先在入厂工作时就不敢提自己是满族。因为一旦提满族就不好找工作”,“在军阀统治时期,排满的更厉害,一提到旗人,根本找不到工作,就是有工作,也要被解雇”^[1](116)]。这也使得旗人更加难以摆脱贫困。

二、旗人及其认为低贱的行业

由于受到社会歧视,再加上自身长期不事劳作,缺少一技之长,所以迫于贫困,一些旗人只好去从事那些为人所不齿的“贱业”。在《故都旗人之沦落生涯》中就有形象的描述“改名姓籍贯说浙江,嫁汉人满族渐同化。顾颜面暗中充神女,逞歌喉子弟入梨园。二十元卖身做婢妾,一张炕睡

倒满家人。”^[8]

民国时期,有不少旗人选择进入梨园,卖身唱戏。清末旗人普遍喜欢曲艺,但这时旗人唱戏是一种玩票,并不以此谋生(清廷是禁止旗人登台献唱的)。而到民国时期,唱戏则变成一种赚钱为生的手段,戏曲的“贱业”色彩逐渐变淡,但仍然不是高雅的行业,尤其在民国初期,对梨园子弟依然有普遍的歧视。多数旗人艺人是迫于生计、无奈之下才投入此行,比如著名的北京琴书艺人、有“琴书泰斗”之称的旗人关学曾(1922年生)。他儿时家里生活贫困,为了贴补家用,14岁时,经邻里介绍,他便拜常德山、石金荣为师,学唱单琴大鼓,出师后一直在天桥、鼓楼等地撂地卖艺,后才一步步成为名角。^[9](247)]

此外,很多旗人因生活无着,不得不去做人力车夫。民国时期的北京城,人力车是人们出行的最主要交通工具。1924年,“人力车夫就有60000余人”,当时被认为是“除乞丐以外,这些以人类代牛马的东洋车夫算是最穷苦的人了”^[10](1153)]。旗人自鼎革后,由于生计无着,又没有谋生技能,就只好拉洋车。在《益世报》中作者就记载了一位旗人沦为洋车夫的经过“自战事发生以来,北京方面,商民交困,一切情形,业见各报。所最苦的,第一旗人不必说。作者由前门回家,雇了一辆胶皮,这位人,约四十来岁,走了没半里地,就大喘气。后来他叹了一口气和作者说:告诉您,先生,我是厨子头儿,竟指着包办酒席,自从打仗,说妥的酒席全取消了。不瞒您说,我还是个旗人,这样一来,钱粮也休想了,昨天才改的行。”^[11]据李景汉的《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载,“被调查的车夫有6604人,其中旗人数目为1310人,约占20%。但恐旗人中拉车的不止此数”^[10](1162)]。社会动荡加重了旗人生计的困难,甚至有些王公贵族、旗人妇女,为了生活,也加入拉车夫的行列。^[12]

一些旗人女子为生计所迫,也只好做起了一些在当时看来很不体面的行当,如舞女、保姆、使女、女招待等。燕京大学社会学专业学生张怡如在1933年调查了220名女招待的诞生地,生于北平者计195名,其中以旗人为多。^[13](29)]北平一位有名的交际花玉某,二十来岁,先前为舞姬,后成为饭店小姐,就是一位旗籍女子。^[14]

还有一些旗女,为了生存甚至沦为妓女。如

1920年的刘王氏,系镶红旗汉军人,年约五十岁,儿子儿媳均过世,由于所发旗饷难以度日,便当起了暗娼。^③燕京大学社会学系麦倩曾于1931年撰写的论文《北平娼妓调查》中,将北平私娼分为“土娼、外籍妓女与半开门妓女。而半开门妓女就多是满洲‘破乐户’人家,暗中营业以维持生活”^{[15][492]}。其中一位记者认为地安门一带暗娼多,就是由于“这一带旗人最多,由于既无产业,又乏技能,因此很多为贫户,由于顾颜面,所以使得北城多暗娼”^[8]。

还有不少旗人沦落到以乞讨为生。1923年《申报》中就报道过,“以彼力能致食者,尚不免有啼饥号寒之苦。至于固有能能力较差之旗人,值此生活艰难为状,更不堪问。车出阜成、西直、朝阳、德胜等门,见有男男女女,拦车乞钱,络绎不绝者,皆是也”^[16]。现存的京师警察厅档案中也有不少这类记载,如17岁的连平儿,镶白旗人,她以前在陆军被服厂做活,后来无事可做,为了供养家里生活,只好在街上乞讨。^④

贫困至此,自然免不了做出一些偷盗类的犯罪之事。1923年的《申报》记载“去冬,据某君调查西北城一带赤贫旗人,不能自活者为数不下二十余万人,真可惊也。私娼之多,窃案之伙,当然是—定结果矣!”^[16]1934年,严景耀在调查罪犯的犯罪个案时,其中就有旗人因贫走上犯罪的案例,如第49例的案件:

陈德是52岁的旗人。辛亥革命前,他是皇宫里的御前侍卫。他的收入每年600元,另外还有养马的草料费和其他补助费等。他的职务是个肥缺,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如果帝、后不出皇宫,他就无事可作。他没有什么特殊本领办什么事,但他读过些经书。革命前,旗人的生活一般地就是如此。革命成功后,皇帝被废,他也失业了,但有积蓄,可以维持生活。他每天到茶馆和其他旗人下棋。10年后,他的财产几乎搞光了,他的妻子也死了……最后,他只好作点小生意……不久,本钱蚀完了,又没有事做了,不由自主地走上了饥饿的行列。后来他想卖旗人庙里的树,他砍了两棵,卖给商人,过了几天他被发现,被判为盗窃罪。^{[17][78-79]}

严景耀在早先的另一份调查报告《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中就注意到旗人因贫犯罪这一现象,他解释说:

革命以来,即使是全体旗民失养,有消耗而无生产,自然日趋贫穷,政府毫不注意为他们设法救济。再加上近几年来北京几乎常处于恐怖时期,交通阻碍,物价飞涨,铜元价值低落,市面萧条,失业增加,再加上捐税日增、捐目日繁,怎么叫他们能安分呢?^{[18][227]}

三、旗人的社会形象与身份变迁

关于民国时期旗人的社会形象,除了生活贫困和从事“贱业”外,在提及旗人时,人们还往往把旗人与一些标签化的特征联系在一起。

首先是懒。无论是官方,还是媒体、社会大众,都认为懒惰是造成旗人贫困的最主要原因。如1928年北平市社会局所刊布的《救济事业小史》中所言“满族之贫民,实应占平市贫民人口之半。此辈昔资旗粮为生,不事生产,清社既屋,谋生无从,而懒惰性成,积重难返,故北平贫民,旗人实居多数。”^{[19][734]}而在大众媒体和学者那里,这类表述就更为普遍,实在不胜枚举,如《申报》中就曾提及“满清时代旗人何等快乐,吃粮不管事,养成懒惰恶习惯。”^[20]

其次是“穷讲究,好面子”。陶孟和在对京郊满、汉家庭生活费的调查中就讲道“旗人用在非食品消费上的支出比例要比汉人高,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旗人‘爱讲究’。”^{[21][26]}金启琮在回忆中也说“一般旗人没有清早起来就大吃大喝的,总要在洗漱后喝一杯茶,再吃东西。他们认为应该‘冲冲龙沟’,也就是先润一下肠道,有好处。但解放前常听见有人骂‘穷旗人,臭讲究’,甚至认为早上喝茶是‘摆谱儿’。”^{[7][16]}

可见,“懒惰、穷讲究、要面子”已成为旗人的标签,以至于很多人不管某人是否真是旗人,只要有以上特征,便认为此人定是旗人无疑。如《申报》的一位作者到了北平后,看到德胜门附近坐着的一些乞丐女子,便认为“这些乞丐中,有时候自己坐在树底下,叫孩子追赶去乞讨的,大半是没落了的旗人。”^[22]由此可观,社会上对旗人的歧视已经根深蒂固。

再次是贫困、腐化。如穆儒丐在1923年发表在《盛京时报》的小说《北京》中有这样一段描写,“贪财的黄氏撺掇外甥女桂花去窑子时,不屑地对桂花娘说道‘你也不想想,如今是什么时候?如今是民国了!你別想磕嘴硬正的当你那分穷旗人了。如今是笑贫不笑娼的时代,有钱的忘八都

能大三辈,有人管他叫祖宗’”^{[23][55]}。同样的,蔡友梅在《曹二更》中有博二太太对博二老爷讲的一席话“像你宗满洲旗人,你有甚么能为,有甚么本事,有甚么学问?除去提笼驾鸟,下茶馆儿,造谣言,抽大烟,喝烧酒,会熬猪头肉,玩笑耍滑头。排个八角鼓儿,就说在衙门当差。旗下有甚么高超的公事,来行文无事片打到书稿验缺,下仓放钱粮,压个兵缺,吃两包儿空头饷,完了。有甚么警人的玩艺儿,你说我听。”^{[24][634]}

1939年,《申报》的一篇文章《故都宫闱梨园秘史》也写道:

声色狗马,这是亡清时代一般旗人的嗜好……到了民国,北平东城里住着的这般的公子哥儿,还有些世袭的什么王爷,某某将军,可全都讨了饭或是拉了洋车啦。倘你要是个老北平的话,当你出门雇车的时候,瞧见那那些年纪五十上下,佝偻着腰像个老枪的样儿,满口很爽脆的京腔,一步一挪连车子都掌不稳的这辈人,差不多十九都是在少年时代享过福,而饱尝过声色狗马诸般滋味的阔大爷……最可笑是当他们犯了路规,被巡警木棍加身的常儿,他们常会大发牢骚,把亡清前他们家里的威风气派,说给坐车或路旁的人听。有些捉狭的人儿,就拿话打趣他们道“谁叫你们在幼年的时候把福都享尽,不留点乐子现在快活呢?”他们听了也只有长叹一声,依旧干着背朝天,两腿奔忙的工作,怎敢再回首忆当年呢?^{[25][168]}

在口述回忆中,很多旗人还对这种歧视记忆犹新,比如一位叫金秀珍(1918年生)的旗人回忆她小时候,“旗人不吃香,净受人欺负,都说人家骑马我骑人”^{[26][153]}。

最后是隐瞒身份。在这种歧视旗人的社会环境中,许多民国时期的旗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旗人。正如当时报纸上所說的“辛亥革命,旗人毫无准备,居于各省的几全归淘汰,在北平的还可保存几年的生命……最可怜的事情,还是他们现在不敢承认自己为旗人。我们明知道他们是旗人,但若一问,他们就否认了。”^[27]民国的一些调查者也发现,在调查中有很多旗人不愿承认自己是旗人。如许仕廉在调查中国北部人口结构时就提到“自民国以来,因被其他民族种种之歧视,此种歧视,虽无若何明显之表征,但社会中彼此接触,及一切互相工作时,大都鄙夷满族,以为被征

服者、落伍者。故满族之称,多讳言之。其余回、汉两族者,则颇能坦诚相告也……我们在清河调查,就有这个困难。”^{[3][706-707]}同样,在《北平100名女犯的研究》中也谈到“100女犯中,有10个承认自己是旗人,其实数当不止此。”^{[28][312]}针对这种情况,严景耀先生在做感化学校调查时,听到“他们说原籍是大兴县或宛平县甚至通县时,就追问‘你在旗吧?’有的比较直爽,有的则不承认”^{[18][227]}。在口述中,金家瑞说“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的口号,我在中学时就有很深刻的印象,故一直不敢说自己的民族成分,直到解放前夕才报了满族。”^{[1][116]}

此外,还能体现旗人隐瞒身份的是民国初年旗人的大规模改冠汉姓。1912年《满、蒙、回、藏各族优待条件》第六条规定,“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免,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这为旗人改籍提供了法律上的认可。在北京市档案馆所藏的《1912年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所调查的旗人改籍复姓人数统计表》中^⑤,就有1465名旗人冠汉姓,其中还有一些人改入别籍。

	改籍			复姓		
	男	女	合计	男	女	合计
内城	5	4	9	1269	59	1328
外城	0	0	0	109	28	137
合计	5	4	9	1378	87	1465

这只是1912年的统计,在其后的一段时间里,陆陆续续还有很多旗人改姓更名,而且很多人改姓也不会向警察报告,自然也不能显示在统计数字中,所以改姓的真实情况肯定要比统计数字大得多。我们看到,到1949年以后,很少再有旗人还用有满族色彩的姓氏了。这是很无奈的选择,因为会影响到就业,如毓旗说自己的“曾祖父在家族败落后,又经过庚子之乱,逃到保定,靠吃旗地庄园的租子生活。辛亥以后,旗地庄园的土地出了归属问题,只好出去找工作。当时社会排满排的特别厉害,满姓的人找工作极难,后来干脆买了个汉姓,找了朋友入宗祠,入了人家的谱牒”^{[26][125]}。

除了名字上的独特性逐渐消失外,旗人也抛弃了部分原有的生活习惯,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旗人女装。在清初,由于男降女不降,满汉男装上皆一致,但女装上则判然有别。标准的旗人女装

是头戴两把头,足踩花盆底鞋,身着长旗袍。但清亡后,由于旗人统治地位的丧失、社会“排满”风盛,旗人女服的形象一落千丈。在《燕市百怪歌》中作者就讥讽道“头横二尺之小黑板,足踏三寸之厚尖底,言则惊声,笑则燕语。”^[29]于是一些旗人女子不愿再公开穿旗装,正如时人所描述的:“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裁做短衣裳。”^{[30][372]}到民国初期时,北京街头着旗装的旗妇已经不太多了。而到1928年成立的国民政府“对于北平旧政府下的人们有视作俘虏之概。一切都认为要不得”,“最可怜的,是满洲妇人之髻永不复再见”^{[31][26]}。在社会普遍歧视的生存状况中,许多旗人不得不选择了隐瞒自己的民族身份。

总之,旗人贫困化确实是民国时期北京城市的一大社会问题,且由于旗人自身的原因,使得其形象已经被固定化、标签化。也正是由于这种既定的社会形象,才使得旗人大都放弃了自身的民族特征,隐瞒了自己的“旗人”身份。

科恩曾指出,“不应该把族群性看作固有不变的东西,而应当把它当作根据周围的情况不断变化的社会现象或可操作的归属意识来看待,族群性具有随机性、战术性和工具性特征,它是任意的和可变的”^[32]。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民国时期旗人的自我身份认同确实带有一定的工具性,为避免社会歧视,寻求生计,部分北京旗人选择更名改籍,隐瞒自己的旗人身份。但是,这并非必然意味着他们从内心中已放弃族群认同。“族群性是自我和他者互动关系的产物,它受双方的制约,在边界的形成过程中,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33]虽然在与外界互动中,旗人隐瞒了自己的身份,但是旗人的群体意识仍是在延续的:一些满族上层人士有比较强烈的族群认同,他们积极推动成立满族团体或著书立说,通过文化来为自己民族争取利益,为保存民族特征而疾呼^⑥;至于普通旗人,他们在实际的日常生活中,通过延续独特的旗人日常生活习惯、追溯祖先的事功、编纂族谱、举行祭祖等仪式,使得自己的身份意识继续保持,甚至得到一定程度的强化。^⑦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的民族调查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旗人对恢复自身身份的渴望。由此可见民国时期旗人身份认同的复杂性。

注释:

①族群(ethnic group)一般用以指代文化和情感的共同体,而民族(nation)则往往与国家联系在一起,指代有外在政治实体的族群共同体。本文在研究旗人群体时,所关注的是旗人群体在失去政治纽带后的认同问题,因此使用“族群”而未用“民族”。对于“旗人”与“满族”的关系,王钟翰先生认为“‘旗人’体现更多的是‘自称’,而‘满族’是汉人对旗人的‘他称’。”而柯娇燕认为,“旗人”在清前中期是作为军事、政治范畴的一个概念,而这一概念的转化起于19世纪末太平天国及20世纪初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民族”一词的引入,使得旗人被称为“满族”,也使得普通旗人意识到自身为满族人。到辛亥革命后,他们的自我意识再次得到激发与加强。刘小萌认为,随着1928年八旗制度的解体,旗人社会便消失了,而“满族”这一概念并不能涵盖八旗内部的所有成员,但后世的“满族”大多是指“旗人”。可见,“满族”更多是一种外部界定的政治概念,而“旗人”则更多带有自我认知的意味。故此,本文主要采用“旗人”这一称谓,以此来彰显自我认知在族群维系中的重要性。具体可参见:周大鸣《中国的族群与族群关系》,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6-8页;纳日碧力戈《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页;王钟翰《关于满族形成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1期;Pamela Kyle Crossley, *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5-16;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44页。

②目前学界主要关注的是旗人生活的贫困问题,而对旗人的“社会形象”与身份认同的研究则很少。关于旗人生活贫困的研究可参见:戴迎华《清末民初旗民生存状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常书红《辛亥革命前后的满族研究——以满汉关系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赵书《辛亥革命前后的满族人》,《满族研究》1989年第3期;阎崇年《北京满族的百年沧桑》,《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张福记《清末民初北京旗人的社会变迁》,《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等。

③北京市档案馆藏,《驻守地检厅巡官张求信等关于匿函巡警武鑫有扰乱住户事情惩办的报告》,档案号:J181-018-11821,1920-04。

④北京市档案馆藏,《京师警察厅内左一区区署关于幼女连平儿在街乞讨不服驱逐并向巡警骂詈的呈》,档案号:J181-019-32725,1921-01。

⑤北京市档案馆藏,《京师警察厅总务处编: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统计书(民国元年)》,档案号:ZG012-002-00307。

⑥民国时期,一些旗人还成立了团体,如北平满族文化协会。著述如芙萍的《旗族旧俗志》、鲍奉宽的《旗人风俗概略》都详细描述了旗人的日常风俗。芙萍的《旗族旧俗志》(选自《燕京风土录》,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

写于1934年,鲍奉宽的《旗人风俗概略》(参见《满族研究》,1985年第2期)写于1942年。

⑦具体参见:定宜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张琴《北京香山脚下旗人的命运:口述历史访谈录》,台北秀威资讯科技出版社2012年版。

参考文献:

[1]辽宁省少数民族编辑委员会. 满族社会历史调查[M].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9.

[2]〔美〕西德尼·甘博. 北京的社会调查[M]. 陈榆秉,等译. 北京:中国书店 2010.

[3]牛薰鄂. 北平1200 贫困户之研究[A]. 李文海.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底边社会卷(下) [C].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5.

[4]巴尔底山[N]. 益世报,1930-11-01.

[5]维馨. 社会生活:平西蓝靛厂的旗人[J]. 正风(北平1937),1937(2).

[6]陈天华. 猛回头[M].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2.

[7]金启琮. 金启琮谈北京的满族[M]. 北京:中华书局 2009.

[8]故都旗人之沦落生涯[N]. 益世报,1931-06-11.

[9]岳永逸. 老北京杂吧地——天桥的记忆与诠释[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10]李景汉. 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A]. 李文海.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下) [C].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5.

[11]蔡友梅. 厨子拉车[N]. 益世报,1920-07-25.

[12]Y. L. Tong. Poverty in Peking and Its Relief[J]. 社会学杂志,1923(5).

[13]张怡如. 北平女招待研究[D]. 燕京大学学士论文,1933.

[14]旗籍女子[J]. 风月画报,1934(4).

[15]麦倩曾. 北平娼妓调查[A]. 李文海.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底边社会卷(下) [C].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5.

[16]静观. 北京通信[N]. 申报,1923-03-31.

[17]严景耀. 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18]严景耀. 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A]. 李文海.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底边社会卷(上) [C].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5.

[19]北平特别市社会局救济事业小史[A]. 民国史料丛刊[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20]又是一件北京新杀案[N]. 申报,1921-04-24.

[21]陶孟和. 北平生活费之分析[A]. 李文海.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上) [C].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5.

[22]子冈. 北平的妇女[N]. 申报,1934-09-09.

[23]穆儒丐. 穆儒丐京话小说:北京[M]. 台北:台北联出版 2013.

[24]蔡友梅. 清末民初小说书系·警世卷[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

[25]徐慕云. 梨园秘史故都宫闱[N]. 申报,1939-02-14.

[26]定宜庄. 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27]呆. 现在的旗人[J]. 时时周报,1931(3).

[28]周叔昭. 北平100 名女犯的研究[A]. 李文海.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底边社会卷(下) [C].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5.

[29]张江. 燕市百怪歌[A]. 丛书集成三编(83) [C]. 台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

[30]李家瑞. 北平风俗类征[M].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10.

[31]铢庵. 北游录话(七) [J]. 宇宙风,1936(26).

[32]Avner Cohen. *Urban Ethnicity* [M].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74.

[33]Barth Fredrik.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M].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 1969.

【责任编辑 马毓】

Manchu's Social Image and Their Ethnic Identit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DU Pei-hong

(The Institute of Qing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concentrat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chu's ethnic identity and their social image in Beijing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Manchu's life was very poor, and owing to the social discrimination, they became the underclass. Therefore, most of them had to work in menial industry for their livelihoods. In this period, the government, media, and the public, had the discrimination for their habits and customs, thinking these habits are the reasons of Beijing's social problem. In this circumstance, some of them had to hidden their ethnic identity.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Manchu; social image; ethnic identity